

关公崇拜在近代中国藏区： 一个藏汉民族文化交融的典型^①

王 川 刘 波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610051)

内容摘要：论文在学术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从民族文化交融的角度，在归纳了近代以来中国藏区关公帝庙分布与兴建类型后，指出了藏区的关公崇拜不仅具有藏汉民族文化交融的特征，而且堪称藏汉民族文化交融的典型事例。

关键词：中国藏区 关公崇拜 藏汉交融 特征

一、前 言

从清代以来，无论是从上到下，是俗是雅，在内地或四裔甚至于海外华人社区，有一个一致尊崇的、影响最为广泛的俗信神灵，那就是关公。

关公这位俗信神灵的原型是以忠孝节义、武艺超群、战功卓著闻名于世的蜀国战将关羽（160—219），其事迹被历代统治者渲染和神化，地位由侯升公而封王成帝，由人变神，成为佛教尊为护持佛法的“伽蓝神”（藏传佛教从清中期起亦以护法神视之），道教尊为降服妖魔的“关圣帝君”，儒家尊为俗世师表的“武圣人”，使关公有“千古忠义第一人”的美誉，三家竞相崇祀。到了清末，民间宗教的“鸾堂”得到了较大发展，因在“三相代天宣化，合力救劫”的论述推动下，“关圣帝君”即关公的神格也在这一波“鸾堂运动”中再次上升，成为第十八代玉皇。这种说法由清末民初四川一带开始产生，至今仍是中国台湾地区宗教界的讨论焦点。^②可以说，从清代以来，关公本以其忠义和英武受到儒家的推崇，继而佛、道以三教圆融为契机，借助历朝统治者对关羽的提倡及其在民众中的广泛影响而传播，使得关羽成了信仰极为普遍的既为国家祭奠又为民间供奉的“关圣大帝”，成为人神之首，其崇拜从一种民间宗教，转而为三教并尊的神祇、多种传统行业的祖师或保护神^③，成为中华汉、满、藏、蒙、锡伯等众多民族的保护

^① 本文为王川主持的四川省教育厅2006年度省级重点研究课题《近代中国藏区汉人社会生活史研究》（批准号为SA06011）的阶段性成果。

^② 范纯武：《近现代中国佛教与扶乩》，载中国台湾地区《圆光佛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283页。

^③ 在民间，关羽被视为描金业、皮箱业等多种传统行业的祖师或保护神；还有些行业奉关羽为主祀或配祀之神，体现出中国民众多神崇拜的宗教性格。详细参见李乔《中国的行业神崇拜》（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0年版）关于关羽的论述。

神,全体民众心目中的“义种”^①,甚至天地会等民间秘密组织、秘密会党、江湖各色人物,亦奉关羽为崇拜偶像^②。同时,遍布全国城乡各地的关帝庙,成了诸多神灵中香火最旺的神庙。蜀国战将关羽一身密集如此“恩宠”,可以说得上是中国信仰史上一个独特的个案。

1926—1927年,梁启超在京城清华授课时,便以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关羽信仰等俗信神灵为例,指出研究中国宗教史应注意“历代所崇拜的神的变迁”^③。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史学者则说:“建国以来学术界研究孔子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而关羽的研究几成空白,迄今未有改变。毫无疑问的是,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从未把关羽放在眼里,可偏偏这又是对中国民众影响最大的两位人物之一,作为‘愚夫愚妇’可能不知道孔夫子,但没有不知道‘关老爷’的,这一现象不容学术界长期漠视。”^④可以说,对于清代以来中国藏区关公崇拜的研究,虽有一些成果,但是在某些方面的深化研究,仍然大有可为。

在此,本文将内地十分熟悉的关羽与有着独特民族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的藏区联系起来,通过文献和田野调查的大量资料,以关公崇拜这一中国信仰史上的独特个案为研究对象,在前贤及时贤研究的基础上,本着“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的宗旨,归纳近代以来中国藏区关公崇拜的分布,并对中国藏区关公崇拜的藏汉交融特征进行初步总结。

二、近代以来中国藏区主要关帝庙的兴建背景、地点分布及兴建类型

(一) 清代以来中国藏区关公崇拜盛行的背景

在入主中原之前的关外时期,满族统治者就已经开始崇拜关羽。崇德八年(1643),满族统治者便于盛京(今沈阳)建立“关帝庙”;皇太极还亲赐“义高千古”匾额,定“岁时官给香烛”^⑤;入关后,清朝统治者沿袭了明代岁祭关庙之例,正式把祭祀关公列为国家祀典,不仅每年遣官致祭,而且帝王还在深宫秘祭,可谓至信至诚。康熙年间,诏以太牢祀。雍正年间,通行直省所属府州县,择一关帝庙之大者,在供奉关帝主神的后殿致祭。雍正帝说过一段“孔子为圣、关公为神”的名言^⑥,将关公的显赫身份,以及海内外上至皇族、下至村夫百姓对关公的敬仰之情,表述得十分贴切。

清朝是关公崇拜发展的顶峰时期,对关公的祭祀也登峰造极。高宗弘历在乾隆十二

① 昌仪:《“义种”关公——民众心目中的关羽》,载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民间文化》,2001年第1期学术专号(总第100期),第76~82页。

② [德]舒赫格尔(Gustave Schlegel)原著、薛澄清译述:《天地会研究》,台北,古亭书屋,1975年,第173、237页。

③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202~203页。

④ 刘志琴:《公众人物与中国思想史研究(论纲)》一文,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近代中国研究”网页,http://jds.cass.cn/Article/20050915085255.asp。

⑤ (清)崇厚:《盛京典制备考》卷二《庙寺》,奉天督署光绪四年(1878)刻本。

⑥ (清)于敏中等编撰:《日下旧闻考》卷四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册,第698~699页。

年（1747）敕撰《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系统规定了祭祀礼制，对关公祭祀的等级、祭器、祭品、祭期、斋戒、祝版、习仪、祭文、乐章等等，都作了细致严格的规定，将自周代以来近三千年的中国社会关于宗庙祭祀制度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和高度。清朝统治者的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等级森严，同时更说明了清朝统治者对祭祀关公这位护国之神的极度重视和大力提倡。在这种情况下，有清人记载，崇拜关公“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妇女儿童，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大地同不朽”^①。自然，关公传说和信仰在中华各民族地区也逐渐盛行。

随着清政府的推崇，关公崇拜从中原传入藏区，逐渐在中国藏区出现。藏区的第一座关帝庙出现在拉萨一地，该地始建最早的关帝庙——扎什城关帝庙，约始建于雍正十年（1733）或稍后。^②可以说，扎什城关帝庙的修建，揭开了藏区普遍修建关帝庙的第一页。此后，关帝庙在乾隆帝“金川之役”时期出现在大小金川。大小金川的主体在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金川县，小部分在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从乾隆十一年到四十一年（1746—1776），乾隆帝持续用兵，战争长达30年。在战争后期的小金川之役中，清朝官军在美诺（小金川土司关寨）驻兵之处修建了一座关帝庙，这是藏区的又一座建立较早的关帝庙。^③

（二）中国藏区关帝庙地点分布的三种情况

第一，藏区各地尤其是政治中心（如拉萨、日喀则、山南），以及主要的县治所在地。

清末，在康区各地均建有关帝庙，进入民国时期，上述庙宇仍在康藏有分布，所以1939年1月西康建省后，省府所遣调查人员在西康省发现“前清戍康军队及武职人员，多在县治及乡村地方创建关帝庙及城隍庙，迄今庙貌犹在云”^④；以至民国时期西康地区一些县署就设于关帝庙或城隍庙，如“瞻化县署，毁于曩岁藏番退走之际。现有县址，系就该县关帝庙改建者”，“雅江县署闻于往岁失慎焚毁，现仍就该县关帝庙”^⑤。而1939年夏季，路过德格县进藏求法的汉僧邢肃芝（法号碧松、藏名洛桑珍珠）曾见德格县“县政府官署原是个关帝庙，外面看上去好像一艘轮船，地势及左右环境很是协调，视野也很好”^⑥。这一情况，验之昌都地区亦然，如20世纪30年代，观音阁（又称“观音庙”）一度被充作官署。^⑦

①（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三五《关壮缪》，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4月第1版，2006年10月第2次印刷，第3册，第757页。

② 傅崇兰主编的《拉萨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9月版）认为，在扎什城驻藏大臣衙门东面，曾建有一座称查细拉康的小庙，系驻藏清军为清高宗荐寿和七世达赖祝福而建，或与该庙为同一处寺庙。

③ 王川：《拉萨河流域的自然生态与人文景观》，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

④ 刘衡如、杨子和、李章甫、郑少成：《视察道炉甘德白瞻雅江七县报告书》，载《新西康》，第1卷第2期，康定出版，1938年，第33~38页。

⑤ 刘衡如、杨子和、李章甫、郑少成：《视察道炉甘德白瞻雅江七县报告书（续）》，载《新西康》，第1卷第3期，康定出版，1938年，第14~21页。

⑥ 邢肃芝口述、张健飞等笔述：《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8页。

⑦ 任乃强：《西康图经·地文篇》，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第二,藏区各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城镇(如昌都、江孜、里塘、打箭炉,打箭炉即今康定)。

乾隆后期,位于康藏交通线上的里塘,亦建关帝庙。乾隆时代史料记载,当地的“蕃人亦知敬畏”^①。在清代打箭炉修建有关帝庙,系汉藏商民共同出资兴建者,主像除关圣帝君外,还供奉有藏传佛教的度母等神像。1955年4月14日,康定折多塘地区发生7.12级地震,死亡94人,轻伤260人;震中的藏式木结构土石房屋倒塌90%左右。地震裂缝密集成带总长约30公里,康定关帝庙门前数千斤的石狮被震倒,石阶、石条震断,康定县关帝庙受到了一定破坏。^②

第三,藏区各军事要塞(如定日)陆续建立关帝庙,在乾隆晚期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关帝崇拜也在清代时被纳入藏传佛教护法神之中,并且在西藏及其他藏区留下不少关帝庙及许多关帝“显灵”的传说故事。

全盛时期,全藏区的关帝庙多达几十座。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各藏区仍存有各种关帝庙10余座。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藏区仍存有关帝庙七八座。

(三) 中国藏区关帝庙兴建的六种类型

在近代藏区修建的关帝庙,一般均与关帝传说有关。据笔者考察,在藏区及西藏修建关帝庙的缘起,主要有以下六种情况:

第一,各级政府修建,如拉萨磨盘山关帝庙。该庙位于布达拉宫以西约一公里的磨盘山上,藏族人称之为“格萨尔拉康”(即格萨神庙),坐北朝南。恰白·次旦平措著《西藏通史》记载,这座汉藏混合式庙宇是清朝大皇帝及八世达赖喇嘛批示后兴建的。^③这一汉藏混合式庙宇现存建筑物面积约800平方米,是藏汉满蒙各族人民团结抵御外来侵略的历史见证,又是拉萨地区现存唯一的一座关帝庙,还是拉萨地区近代以来多座关帝庙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一座。从2006年12月26日起,磨盘山关帝庙作为“拉萨市重要历史和革命文物”,进入了整体维修阶段,全庙在整体维修后焕然一新,将正式开放。

第二,由内地驻藏官兵修建者,如拉萨始建最早的关帝庙——扎什城关帝庙,位于拉萨“三大寺”之一色拉寺的附近。根据碑文记载,这里原为流沙荒郊,被开发为兵营,修建的原因是:“恭惟我国家抚有区夏……幅员之广,千古罕有。举凡王师所向,靡不诚服,关圣帝君实默佑焉。唐古忒(即西藏)在胜朝为乌斯藏,自圣祖仁皇帝时归入版图,驻兵札什城,恫建有关帝圣君庙。灵应异常,僧俗无不敬礼。”^④类似的还有日喀则关帝庙、帕里的“汉房子”、亚东的“格萨尔拉康”关帝庙等。

第三,由汉藏商民共同出资兴建者,主像除关圣帝君外,还供奉有藏传佛教的度母等神像。如乃东县泽当镇的关帝庙及打箭炉关帝庙等。

① (清)陈登龙:《里塘志略》卷上《庙宇》。

② 四川省民政厅:《甘孜州1900~2000年地震灾害纪实》,参见<http://210.72.100.6/逐次地震救灾案例/1950-1965/1955年4月14日四川康定地震.htm>。

③ 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等著,陈庆英、许德存等汉译:《西藏通史》,西藏自治区社科院,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91页。

④ 和琳:《关帝庙碑文》,见松筠《卫藏通志》卷六,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根据西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 1962 年在山南地区的调查，在吐蕃时期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停居过的泽当，有一座汉藏人民共同敬奉的关帝庙，当地藏民俗称为“汉神殿”，有时也称为“格萨尔拉康”。这一座关帝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①。由于当地汉藏民族世代友好，频繁通婚，亲如一家，所以每年藏历九月十三举行关帝庙会时，当地汉藏混血后裔及藏族群众同汉族一起，到关帝庙上香叩头、求签卜卦；藏族也进献哈达，求签问卦。关帝庙也欢迎藏族群众敬献酥油灯。^②

第四，入藏定居的汉民发起，汉藏人民共同修建者，如西藏拉萨市的“云南庙”、昌都江卡南墩的“汉人寺”；甘南夏河县拉卜楞寺关帝庙，在关帝神龛帝侧还配有阿民念钦山神及班禅大师画像。西藏嘉黎县被称为“加拉公寺”的关帝庙则是由进藏部队后裔修建，其后由汉藏人民共同供奉的。

第五，在原藏传佛教寺院内附建的关帝堂或加塑有关圣帝像，如扎囊县的桑耶寺、堆龙德庆县的楚布寺等，此类当是藏族已认同了关圣帝君，把它当作一般护法神之一来陪侍供奉。^③

第六，多个神灵合祀，如关庙与丹达神庙、瓦合神庙的合二为一。

西藏昌都关帝庙始建的具体年代不详，原来供奉关帝，后来供奉丹达神，故也被称为“关帝庙”^④，当地藏族人则认为供奉的是格萨尔^⑤，使之成为藏区与内地共同信奉的神灵。

三、藏区关公信仰的藏汉交融特征

早在唐代，唐与吐蕃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到了北宋时期，吐蕃史料中已有蕃（藏）汉交界地区，即藏汉边缘地区吐蕃人崇拜“包公”——包拯的记载。从明清之际起，藏区陆续建起了关帝庙，尤其是在关公信仰的鼎盛时期——清代，关公也被纳入藏传佛教护法神之中，而且在西藏及其他藏区留下不少关帝庙及不少关帝显灵的传说故事。

直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各藏区仍存有各种关帝庙 10 余座。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之后，藏区仍残存七八座关帝庙。这一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值得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爱护，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值得文化、文物考古、旅游管理等部门高度重视，同时要对其进行专门的数据搜集、整理以及研究，有计划、有步骤地勘查、保护、维修和利用这笔民族文化遗产。

^①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索南旺堆、张仲立主编：《乃东县文物志》，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铅印，1986 年版，第 71~73 页。

^② 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藏族社会历史调查》，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第 2 辑，1988 年版，第 53 页。

^③ 陈崇礼：《藏传佛教地区的关帝崇拜与关帝庙考》，载《西北民族研究》，1999 年 2 期，第 183~192 页。

^④ 夏川：《雪域放歌——两次进藏诗文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 65 页；林田：《进军西藏日记》，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377 页。

^⑤ 马丽华：《藏东红山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51~54 页。

关公崇拜在藏区的流行,类似于天后信仰之流传于四川地区,或者土主崇拜之流传于西南民族地区,虽有统治阶级“神道设教”的企图,但由于在信仰仪式等方面与藏区宗教类似,因此,近代以来,藏区的关帝庙,原来主要的信仰者是在藏区各地的内地汉满等族,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藏区的藏族亦加入了信仰者队伍,使得藏区各地的关帝信仰被赋予了明显的藏汉交融特征。这可以从寺庙名称,供奉神灵、神灵塑像造型,建筑布局,祭拜仪式及节日,信众等五方面明确看到:

第一,“关帝庙”名称方面的藏汉交融。藏区的关帝庙,无论是被称为“关帝庙”,还是被俗称为“云南庙”,或是当地藏族群众俗称为“加拉公寺”(意即“汉人寺”、“汉神殿”、“汉神庙”)、“革塞结波”、“格萨尔拉康”(意即“格萨尔庙”),虽然称谓有异,却一致地体现出藏汉交融这一特色。

第二,建筑布局、式样、内外布置等方面的藏汉交融。在建筑布局、式样上,西藏山南泽当镇关帝庙建筑的殿堂屋架结构系抬梁式,屋顶为硬山式,布局则与内地关帝庙相似,而墙体结构、附属普通住房则全部采用当地藏族建筑的基本式样。

在关帝庙内外布置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关帝财神庙”山门的匾额则有由藏汉两种文字镶嵌的“关帝庙”金字牌匾;拉萨磨盘山关帝庙正殿则采用刻有篆体“寿”字的瓦当;西藏山南泽当镇关帝庙原来有铸有汉字的铜钟、木鼓、汉文楹联,拉萨磨盘山关帝庙原来悬挂有“忠义宣昭”等50多块金字木匾,至今仍树立有《磨盘山关帝庙碑》等清碑;如此等等,均体现了藏汉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交融渗透、吸收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

第三,供奉神灵、神灵塑像造型等方面的藏汉交融。

关帝庙主供关帝,这一点,无论在内地还是藏区,均不例外。如现今西藏乃东县的关帝庙等还保持着原来的面貌。但是,藏区关帝庙除了主供关帝外,往往还供有当地藏族群众信仰的其他神灵。一般是正殿供关公,后殿供格萨尔王。如现今西藏山南泽当镇关帝庙,就供有土地神,而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关帝财神庙”则供有阿尼念钦神(藏民崇敬的山神)等。详见表1。

表1 藏区、内地关帝庙供奉神灵异同表

	主供	附 供			
		内地神灵		藏区神灵	
		历史人物	神话人物	历史人物	神话人物
藏区关帝庙	关帝	周仓、关平、张飞等	二郎神、土地神、财神等	诺布桑布(西藏巨商)	阿尼念钦神(藏民崇敬的山神)、度母(观音菩萨)、千手观音、持金刚、文殊菩萨、莲花生大师、达珍
内地关帝庙	关帝	周仓、关平、张飞以及刘备等	土地神、财神、其他神灵	/	/

在供奉的关公等神灵塑像的造型上，夏河县“关帝财神庙”的关公塑像，一手托长髯，一手持《春秋》，威严慈善，造像与内地无异，但关帝神龛一侧，却插满象征吉祥财富的“财箭”，成为当地藏族群众祈求财富的象征。关公神像右侧，则供奉阿尼念钦神和十世班禅大师的大幅照片，左侧供奉着二郎神像，三神共列一殿。此外，西藏山南泽当镇关帝庙等亦类似，关帝与度母（观音菩萨）、持金刚、达珍等同处一殿。

第四，供奉神灵的祭拜仪式、节日等方面的藏汉交融。在供奉神灵的祭拜仪式上，夏河县“关帝财神庙”等受到了藏汉人民的共同供奉，内地塑像造型的关帝像前的香案上，陈放的却是藏族特有的一盏盏酥油灯，贡献的是青稞锅盔，在几簇花枝之上，挂满了藏族同胞敬献的或洁白或金黄色的哈达；当地藏族群众按照习路口念“六字真言”，手转转经轮，叩长头。西藏山南泽当镇关帝庙则在每年藏历九月十三举行关帝庙会时，当地汉藏混血后裔及藏族群众同汉族一起，到关帝庙上香叩头、求签卜卦；藏族群众也敬献哈达、酥油灯，求签问卦。

在供奉神灵的节日上，现今夏河县“关帝财神庙”香火十分旺盛，每逢初一、十五和佛教节日更是门庭若市，尤以每年大年三十香火最为鼎盛，藏汉信众把整个庙宇围得水泄不通。

第五，信众构成上的藏汉交融。中国藏区近代以来的关帝庙为藏汉人民共同敬奉。如夏河县“关帝财神庙”始建于20世纪初，由在拉卜楞一带经商的山西商人与当地藏汉群众共同捐资兴建；“文化大革命”中该庙被毁。1988年，当地藏汉群众拉锐、王彦、徐少光等发起重建，得到藏汉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拉卜楞寺及该寺贡唐仓活佛、第六世嘉木样大活佛等均有捐助，当地藏汉群众更是踊跃捐献。新庙于1990年8月15日落成，当地藏汉各族群众6万多人参加开光大典，敬献哈达。西藏山南泽当镇关帝庙则由于当地汉藏民族世代友好，频繁通婚，亲如一家，所以每年藏历九月十三举行关帝庙会时，当地汉藏混血后裔、藏族群众同汉族一起，到关帝庙上香叩头、求签卜卦、献哈达和酥油灯。

由此可见，中国藏区近代以来的关帝庙，从名称到建筑布局、式样、内外布置，供奉神灵、神灵塑像造型，神灵的祭拜仪式、节日，以及信众构成等等各个环节，均体现了很强的藏汉交融特征，可以说是藏区多元文化共存的典型表现之一。

有学者总结到：对关公的“信仰程度因地因时而异，信仰方式因人因民族而不同，但是归结起来讲，关羽信仰内容主要体现在忠义神勇的特点上”^①。可以说，关羽信仰与崇拜，清代以来在上层僧俗统治阶级的推动下，经过多年的发展，藏区各地的关帝信仰被赋予了明显的藏汉交融特色，关帝形象进入了藏传佛教的仪轨文书、民间故事等，成为藏传佛教的护法神，已经融入了藏族文化。自然，“关帝信仰在中国藏区的传入及被接受，是清代以来藏汉交流的大事，也为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可资研究的史例”^②。可以说，关公信仰与崇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以来的中华藏、汉、满、蒙等民族的文化交流，巩固了彼此之间的认同感和共同的国家观念，也激发了中华民族

① 林继富：《灵性高原——西藏民间信仰源流》，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0页。

② 王川：《拉萨河流域的自然生态与人文景观》，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为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发挥出重要作用。所以，作为一个列入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祀典的民间神，关帝兼具正统性与民间性的身份，地方社会的关帝崇拜亦由此成为包含着民间文化（俗文化）、精英文化（雅文化）两种不同传统的综合物。

中国藏区和中国其他民族地区的关公崇拜及关帝庙，是中华民族认同感的体现标志之一，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有力历史见证。藏区的关公崇拜，不仅具有藏汉民族文化交融的特征，而且堪称藏汉民族文化交融的典型事例。研究中国藏区以及中国其他民族地区的关公崇拜及关帝庙，无论是对于研究历史上的藏汉、满汉、蒙汉等关系及文化交流，还是对于现今的民族团结和“民族和谐”构建的，都是一件兼具学术研究与现实意义的有益之事。